

日据时期台湾茶业同业组织业务演变述论

王玉国

(厦门大学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茶是台湾最重要物产之一,茶业也成为近代以来台湾重要的产业之一。日据时期,台湾茶业同业组织几易其名,并在短期内实现了制度的近代化。台湾茶的输出方面,注重美国和南洋市场,随着日本侵华的扩大,由南洋转向中国大陆,其输出市场随着日本的侵略扩张而扩大。在营销方式上,通过参加各类博览会及举办吃茶会,扩大台湾茶的影响。同时,同业公会查处粗劣茶叶,规范行规,对茶商奖惩分明,加强行业自律。在日本殖民当局垄断绝大多数资源的情况下,茶业同业组织不得不服从台湾殖民经济。

〔关键词〕日据时期;茶业同业组织;业务演变

中图分类号:K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114(2015)03-0048-08

DOI:10.16007/j.cnki.issn2095-7114.2015.03.007

茶是台湾最重要物产之一,茶业也成为近代以来台湾重要的产业之一。华商在与外商洋行竞争中,为加强同业间的团结合作、规范经营,于1889年成立台湾茶业同业组织——茶郊永和兴。日本殖民台湾后,茶业同业组织先后更名为“台北茶商公会”、“同业组合台北茶商公会”、“同业组合台湾茶商公会”、“台湾茶商公会”,延续至今犹存其迹,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对于日据时期台湾茶业同业公会的研究,已有部分成果^①,但对于其业务变迁却较少关注。本文拟从业务的角度,探讨日据时期台湾茶业同业组织业务演变。

一、茶业同业组织产品输出地区的演变

1860-1863年间,台湾在《天津条约》及其附属条约规定下,正式向西方列强开放通商口岸,外商及洋行纷至沓来。据海关资料,1868-1895年间,茶的出口总值共占同期台湾出口总值的53.49%,^{[1](P2)}茶是台湾对外贸易重要产品之一。外商及洋行资本雄厚,并享有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在茶叶贸易中占有绝对优势。而华商则倍受排挤和盘剥,因此需要同业之间加强团结合作,共同抵御外商及洋行。同时,国际市场对台湾茶叶需求增加,部分加工者为了博取厚利而粗制滥造、掺杂混劣、短斤少两,影响了台湾茶叶的国际声誉。如何规范生产,加强行业自律,挽回台湾茶叶的国际声望,也促进了台湾茶业同业组织的出现。基于上述两个原因,1889年,台湾茶业同业组织——茶郊永和兴在台北大稻埕成立。茶郊成立之后,对“产品之品质管制、业者彼此间的和睦、工人之救济、对政府之建议等方面,均斐然有成”。^{[1](P16)}根据日据时期调查,茶郊永和兴是乌龙茶商的同业组织,包种茶商的同业组织为“铺家金协和”。但可惜好景不长,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茶郊永和兴也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不断整合,更改名称。

〔收稿日期〕2015-04-07

〔作者简介〕王玉国(1975-),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2JJD810002)。

①徐英祥、许贤瑶《台北市茶商业同业公会史》(台北市茶商业同业公会,2000年);许贤瑶编译《日治时期茶商公会业务成绩报告书(1917-1944)》(“国史馆”,2008年);潘健《日据时期台湾茶业同业组织制度变迁探析》(《福建论坛》2012年12期)。前两者以档案资料汇编及介绍性为主,后者则是以制度变迁视角加以论述。

1897年,永和兴改组为“台湾茶商公会”。1898年,台湾茶商公会与“铺家金协和”合并,纳入茶箱制造业者,更名为“任意组合台北茶商公会”;1915年,根据1914年颁布的《台湾重要物产同业组合律令》,更名为“同业组合台北茶商公会”;1937年,因业务范围从台北州扩大到新竹州,更名为“同业组合台湾茶商公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台湾的茶业公会;1944年,更名为“台湾茶商公会”,撤去“同业组合”四字,恢复为任意组合型态的组织。1945年,台湾光复,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将其更名为“台湾省茶叶商业同业公会”。

台湾出口的茶叶包括乌龙茶及包种茶,其中以乌龙茶为多。在1895年之前,乌龙茶的主要输出地是美国,包种茶则以南洋为主要输出地区,少数的乌龙茶、包种茶出口至中国大陆。^{[1](P21-22)}在日据时期,台湾茶对外输出基本原有的结构,乌龙茶输往美国,包种茶输往南洋,但在具体的年份上则因时局等因素而略有变化。

表1 台湾包种茶输出地及数量表(1915年—1935年)

单位:箱(23斤/箱)

年度	爪哇	新加坡	安南	暹罗	马尼拉	缅甸	中国大陆	冲绳	其他	合计
1915年	200000	6800	12000	13700	5500			6648		244648
1916年	217681	12401	23436	21601	7273	70	912	11689		295063
1917年	157476	11395	25002	27582	10176	366	142	19397		251536
1918年	153106	12271	21904	42640	12841	635	427	18972		262796
1919年	190603	22758	1011	34095	8627	84	627	19984		277789
1920年	175177	8753	29349	36578	6675		3493	19225		279250
1921年	184710	9056	3131	51402	5700		1596	7429	17	262681
1922年	180999	9319		68779	5123		2004	6424	41	272689
1923年	195816	15430		81202	7357		3827	15762	1588	320982
1924年	216227	22195		52827	6845		2599	4500	34953	340110
1925年	228998	24923		54478	6350		3344	1278	56148	375519
1926年	221577	28074		55527	6808		2422	1319	50125	362852
1927年	260344	5879		36437	6071		1713	1647	22294	334384
1928年	259830	840		44881	4125		1047	2286	28837	341846
1929年	203176	4779		38674	3690		3693	2785	29930	286727
1930年	185282	1614		35439	2300		4212	2200	36986	268033
1931年	116640	1796		5544	20		10142	5736	30	141621
1932年	32672	9491	12861	32136			23476	10889	673	151898
1933年	56957	19422	23847	33170			46169	9523	1649	190737
1934年	33722	21683	21192	37304			50319	18388	5438	188046
1935年	17125	21168	18814	43179			36171	16028	9711	162481

资料来源:根据许贤瑶编译《日治时期茶商公会业务成绩报告书(1917—1944)》统计

通过表1可以看出,从1915年—1929年间,台湾对外输出包种茶基本呈上升趋势,并在1925年以375519箱达到顶峰。从1929年之后,开始呈下降趋势,1931年达到谷底后,又有所回升,但1933年的190737箱,仅为1925年的1/2强。这是因为1927年,日本侵华,东南亚华侨抵制日货,导致包种茶出口减少。1934年,“香港暹罗方面之输出,因排日运动终息,恢复常态。”^[2]在中国东北,由日本操控的伪“满洲国”于1932年成立,台湾将包种茶市场转移,出口又逐渐增加。1936年后,包种茶继续维持对南洋的输出,但对“伪满洲国”的输出大幅度提升,从1936年的1532560斤提高到1938年4963405斤,已经达到1938年

总输出量的 75.67%。包种茶对“伪满洲国”输出大幅度提升和茶商公会的积极推广密不可分。

1933年,世界经济不景气,台湾的包种茶也受到冲击,而东南亚地区又抵制日货,让台湾的包种茶也受到影响。是年4月,茶商公会会长陈天来在《台湾日日新报》上撰文,指出“现下满洲国之市场,大有厚望”,但“中国茶,其制法及品质,与台湾茶有异”,希望茶户“各行研究制造”,“若得成功,则我台湾茶,未来之唯一生路也”。同时,他还希望“政府当局竭力后援,讲究最善之策,如品质改良、生产费、运资之低廉运动,宣传扩张抬高台湾茶声价,或融通低利资金。”^[3]从8月9日开始,陈天来前往“伪满洲国”大连、奉天、新京、吉林、哈尔滨、营口各地,考察茶叶市场,历时1个月。在考察过程中,将携带数千包包种茶与乌龙茶,免费提供品尝,致力开拓新市场。^{[4](P111)}经过考察,陈天来认识到中国东北市场潜力巨大。1934年1月,陈天来再次在《台湾日日新报》上撰文,指出“满洲市场,乃台湾茶之新市场”,认为中国东北的茶消费总量巨大,台湾茶“将来大有发展余地”,并认为日本和伪“满洲国”经济联系密切,依照“特惠关税条约,台湾茶应蒙特惠税恩泽”。^[2]是年10月25日,茶商公会分别向台湾总督府、台北州知事、台北市尹提出陈情,希望降低茶叶出口“伪满洲国”的关税。^{[4](P115)}1936年1月,茶商公会派岩田理事前往中国东北,拜会伪“满洲国”官员,恳请降低关税,但“伪满洲国”官员以关税是其重要财政收入而拒绝。^{[4](P119)}1938年10月20日,茶商公会再次向“伪满洲国”经济部商务司长罗振邦提出陈情,要求增加台湾茶需求量。^{[4](P134)}茶商公会还在“伪满洲国”举办台湾茶展示会,拓展销售市场。1937年9月至10月,茶商公会派出殖产局特产课属古泽悦次、茶商公会会长陈天来、茶商公会书记长朱阿西、茶商公会评议员中野十郎、刘宗妙、茶商公会代议员王水柳等官员,前往中国东北主要城市举办展示会。9月18日在大连市大连商工会议所楼上,9月22日在营口旧市街汇海楼饭庄,9月26日在奉天市奉天商工会议所楼上,9月30日在新京市纪念公会堂楼上,10月3日在哈尔滨市道外新世界饭店。在展示会上,陈列台湾茶样供当地茶商及官民参观,免费发放介绍台湾茶的小册子与明信片等宣传品,加强当地民众对台湾茶的认识。展示会外,茶商公会还宴请各地茶商及相关官民,交换意见,赠送各种茶样,恳请各地茶商协助进入当地市场。^{[4](P126)}次年10月20日—11月25日,茶商公会再次前往大连等15个主要都市拓展台湾茶销路,在大连、营口、奉天、新京、哈尔滨、安东等6处,设宴招待茶商及相关官民500余人,举办有关台湾茶座谈等,同时奉送茶样及宣传海报,大力宣传台湾茶。另外,在大连、奉天、新京、哈尔滨4个城市街头,还直接让消费者大众免费试饮。^{[4](P137)}1938年7月1日,适逢台湾茶对伪“满洲国”输出5周年,茶商公会向对伪“满洲国”发展的茶商表示感谢,向91家茶商颁发感谢状及蝴蝶兰圆形壁挂纪念品,大连7家,安东3家,营口31家,奉天14家,抚顺2家,辽阳1家,铁岭1家,开原2家,四平3家,公主岭1家,新京9家,吉林1家,哈尔滨12家,齐齐哈尔3家,牡丹江2家。^{[4](P136-137)}1939年,茶商公会为在“伪满洲国”宣传台湾茶以及拓展销路,在大连专门设置联络员,进行市场调查及联络。^{[4](P150)}在茶商公会的积极努力下,台湾茶对伪“满洲国”的输出得到显著提升,包种茶从1932年的11553斤增加到1938年的3395789斤,红茶也从1932年的24122斤增加到1938年的2480341斤。

表2 台湾茶输出伪“满洲国”数量表(1932年—1938年)

单位:斤

年度	包种茶	红茶	合计
1932年	11553	24122	35675
1933年	470987	70757	541744
1934年	1090669	255331	1346000
1935年	1293094	350008	1643102
1936年	1052036	305749	1357785
1937年	1516920	779176	2296096
1938年	3395789	2480341	5876130

资料来源:许贤瑶编译《日治时期茶商公会业务成绩报告书(1917—1944)》,台北:“国史馆”,2008年,第135页。

1939年之后,茶商工会对输出地的统计重新划分,分为日本、中华民国、关东洲、“满洲国”和第三国。通过表3可以看出,台湾茶对中华民国的输出已经超过对“伪满洲国”的输出,成为新的增长区域。其背后的原因就是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其控制的区域逐步扩大,从华北到华东都已掌控在日本手中。茶商公会的输出地也随着日本的侵略而逐步扩大,还前往各地“慰问”日本侵略者。1938年10月23日-11月28日,茶商公会指派会长陈天来、书记长朱阿西、评议员刘宗妙、王添灯、组合员陈荣川等人,前往上海、南京、青岛、济南、天津、北京、张家口、山海关、奉天、大连等地,对南京的烟部队本部以及第三舰队海军武官室,北京寺内部队本部,“敬献乌龙茶”、“亲切慰问皇军勇士之辛劳”。^{[4](P138-139)}

表3 台湾茶叶输出量比较表(1939年—1943年)

单位:斤

	年度	日本	中华民国	关东洲	“满洲国”	第三国	合计
包种茶	1939-1940	590299	1108768	5018567	328890	416120	7462644
	1940-1941	658085	2320670	1422337	1148450	351670	5901212
	1941-1942	858926	3587928	1564902	2540284	270872	8822912
	1942-1943	816365	3592029	1389915	1442062	1015201	8255572
红茶	1939-1940	1502840	387088	883955	618304	5171463	8563650
	1940-1941	1593995	1434849	400134	724643	4622819	8816440
	1941-1942	1367295	1838953	998007	1116348	837464	6158067
	1942-1943	1988557	1389740	343337	786835	1562836	6075305
乌龙茶	1939-1940	5948				3624426	3630374
	1940-1941	2025				2310474	2312499
	1941-1942	12273	300	375		1779	14727
	1942-1943	16930	9994	10616		1005	38545
其他茶	1939-1940	231285	65954	44429		840132	1181800
	1940-1941	216950	124910	14093		264731	620684
	1941-1942	279737	442921	27730	20000	12672	783060
	1942-1943	717264	632535			64718	1414517
合计	1939-1940	2330372	1561810	5946951	947194	10052141	20838468
	1940-1941	2471055	3880429	1836564	1873093	7589694	17650835
	1941-1942	2518231	5870102	2591014	3676632	1122787	15778766
	1942-1943	3539116	5624298	1747868	2228897	2643760	15783939

资料来源:许贤瑶编译《日治时期茶商公会业务成绩报告书(1917—1944)》,台北:“国史馆”,2008年,第809页。

日本殖民台湾以来,台湾包种茶对外主要输出地从东南亚转移到伪“满洲国”,进而转移到中华民国,其发展演变是和日本对华侵略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1940年12月及1941年2月,茶商公会会长陈清波两次前往厦门,调查华南茶叶市场。1941年3月1日,在厦门成立福建茶业股份有限公司,希望以厦门为中继地,谋求对南洋的发展。^{[4](P162)}这是因为日本已经占领东南亚等地。因此,茶商公会是伴随着日本侵略扩张而拓展其输出地的。美国一直是台湾乌龙茶最重要的输出地,1937-1939年间,台湾分别向美国输出2845556斤、3690391斤、3658576斤,占当年对外输出的89.71%、87.61%、94.89%。但1942年后台湾乌龙茶对第三国的输出锐减,其原因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对日宣战,影响台湾茶的对外输出。因此,茶商公会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其业务的发展是和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息息相关的。

二、茶业同业组织营销方式的变迁

1851年,英国举办万国工业博览会,展示世界文化与工业科技,促进世界各国的交流。英国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举办时间长、展出规模大、参展国家多、影响深远,不但成为世界博览会的滥觞,而且其展示产品和技术、拓展渠道、促进销售、传播品牌的宣传形式也为各国所效仿,在其后世界各国争相举办世界博览会或在国内举办相关的展览会。茶商公会积极参加各种博览会、展览会,展示相关产品,吸引客人,主要的情况如表4:

表4 茶商公会参加博览会一览表

时间	博览会名称	地点	参观人数			备注
			免费	收费	合计	
1920年3月20日—5月20日	福冈工业博览会	日本				
1921年3月15日—5月13日	九州冲绳八县 联合物产共进会	日本	7598	57338	64936	60天
1924年3月20日—5月20日	京都市博览会	日本	14591	95548	110139	62天
1925年3月20日—5月3日	熊本市共进会	日本	6514	48391	54905	45天
1925年3月17日—4月30日	大阪纪念博览会	日本	1847	62876	64723	45天
1927年	东亚劝业博览会	日本	6146	58465	64611	60天
1928年9月12日—11月30日	阪神博览会	日本			16463	79天
1939年12月8—14日	泰国博览会	泰国				7天
1939年4月30日—	万国博览会	美国				
1940年9月1日—10月20日	朝鲜大博览会	首尔				
1941年12月8—14日	曼谷第三回 商品展示会	泰国				7天
1941年12月18—19日	台湾物产样品展会	泰国				2天
1942年9月14日—10月31日	大东亚纪念博览会	日本				
1942年9月28日—10月1日	输出共荣圈 交易商品展示会	日本				
1942年9月15—20日	大东亚资源展览会	台北				6天
1942年12月20日— 1943年2月20日	西贡商品 展示博览会	越南				

资料来源:许贤瑶编译《日治时期茶商公会业务成绩报告书(1917—1944)》,台北:“国史馆”,2008年,第82、85、150、158、160、168、175页。

从表4可以看出,从1924年到1943年间,茶商公会共参加16次的博览会,少则2天,多则79天。地点除了台北外,还包括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美国等。需要指出的是,除了1940年在美国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之外,在泰国、越南和朝鲜举办的博览会都和日本的对外侵略息息相关。1910年,日军包围汉城皇宫,强迫韩国皇帝李垆认可《日韩合并条约》,从此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越南原本是法国殖民地,因法国在二战期间被德国攻占,越南殖民政府力量薄弱。1940年9月,日本派兵进攻谅山,击败法军,获得在越南的支配地位。因日本侵华,台湾茶一度在东南亚受到华侨抵制。1942年12月20日至1943年2月20日,茶商公会参加在越南西贡市举办西贡商品展示博览会,对华侨街的华侨,“每户免费发送台湾包种茶,让他们重新认识台湾茶,提升台湾茶之声价”。^{[4](P175)}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亚洲泰国是除了日本、中国外唯一的独立国家,敬佩日本的强国之路,派遣大量留学生前往日本学习。而日本为了与英美争霸,也积极扶植泰国,并帮助泰国训练海军、建造潜水艇。虽然日本和泰国关系友好,但日本偷袭珍珠

港后,日军为取道入侵马来亚而入侵泰国。泰国短暂抵抗后,被迫同意日本的要求,给予日本其国内所有铁路、公路、机场、船坞、仓库、通信系统和军营的通行权及利用权,丧失部分主权。原计划在1941年12月8日起,举办为期7天的第三回曼谷商品展示会,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止,茶商公会转而参加18-19日在曼谷日本商工会议所举办的台湾物产样品展会。^{[4](P168)}由上可见,茶商公会在朝鲜、越南、泰国参加博览会,是与日本殖民侵略密不可分的。此外,茶商公会参展的部分博览会,有接受台湾总督府的补助金,诸如1920年的福冈工业博览会接受补助金21620圆,^{[4](P14)}1921年的九州冲绳八县联合物产共进会接受补助金2800圆,^{[4](P16)}可以看出茶商公会与台湾总督府互动良好。

博览会商品众多,吸引广大参观者,因此也是展示商品、促进消费的良好时机。茶商公会积极参加各类博览会,借机推销台湾茶。在参展的过程中,茶商公会主要采取3种促销手段:(1)陈列台湾茶样,向参观者介绍台湾茶。1939年的泰国博览会,茶商公会陈列茶样39点,包种茶28点,乌龙茶5点,红茶6点。^{[4](P150)}(2)设置吃茶店供参观者饮用。1903年大阪博览会,茶商公会就设置吃茶店。^[5]在之后历次的博览会中,大多都会设置吃茶店,免费或收费向参观者提供饮用,可以现场品尝台湾茶,借以吸引参观者。1921年举办的九州岛冲绳联合共进会,“台北茶商公会所经营之台湾吃茶店,自开馆以来,大有千客万来之态”。^[6]1924年,茶商公会赴日本参加京都市博览会,展期共62天,总共有110139人次饮用台湾茶,平均每天1776人次。^{[4](P82)}(3)赠送样茶及明信片等纪念品。现场饮用固然能扩大台湾茶的影响,但如果能借助新闻媒体报道,则更能扩大台湾茶的声誉。1940年的泰国宪法颁布纪念博览会上,茶商公会免费赠送台湾茶给日本、泰国官民及泰国新闻社等60多个单位。^{[4](P160)}通过这些措施,让各地的参观者全面详细的了解台湾茶,扩大了台湾茶在当地的销售。

博览会的展期是固定的,上述宣传促销虽然取得良好效果,但宣传是暂时性的,难以实现长期效果。因此茶商公会在参加博览会之外,也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宣传台湾茶。1924年,茶商公会为持续介绍台湾乌龙茶,在京都皇家西餐厅常设吃茶店,每月补充相当数量茶叶。^{[4](P83)}同年,茶商公会向京阪地区的主要官署、各公司、饭店及料理店等免费提供茶叶,又藉海报与小册子,在车站等公共场所分发宣传,举办有关台湾乌龙茶的演讲会。委托大阪朝日新闻,散发20万张传单。^{[4](P83)}1937年,茶商公会制作大小香烟盒4300个,“透过输出茶商分发给在各消费地之主顾,博得好评”。^{[4](P129)}同年,茶商公会还在台湾、日本及伪“满洲国”的报刊杂志刊登广告,在伪“满洲国”发放“台湾茶与满洲为题”的小册子及“图画明信片”等,广泛宣传。^{[4](P129)}1938年,茶商公会“制作印有台湾美女之精美宣传海报3000张”,分发日本国内和伪“满洲国”客户,“制作优美的宣传海报7000张”,分发欧美各国客户。^{[4](P140)}此外,茶商公会还在大连、大阪、东京等地的台湾物产介绍所内,设置台湾茶样品如主题陈列架,宣传台湾茶,拓展销售网。^{[4](P127)}总之,茶商公会通过赴博览会参展,设置吃茶店,免费赠送茶样以及广告宣传等多种方式,刺激顾客的购买欲望,提升商品的价值感。这些方式,虽非茶商公会首创,但大大推广了台湾茶的影响力。

三、茶业同业组织自律措施的加强

在同业公会中,自律是一种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行为,自律程度的高低是一个同业组织发达水平的标志,也是同业组织能否良性运行的重要因素。茶郊永和兴成立之初,为挽回台湾茶叶的国际声望,就要求加强行业自律。日本殖民台湾后,茶商公会仍注重行业自律,查处粗劣茶叶,规范同业行规,对茶商奖惩分明。

查处粗劣茶叶成为茶商公会自律的重要内容之一,通常对于违法者予以严惩,没收伪劣茶,并处以罚金。早在1897年10月,台北茶商公会就取缔粗恶茶。^[7]1899年,台北茶商公会再次查处粗恶茶,对不良业者予以处罚。^[8]茶商公会注重茶的品质,担心“浸水茶输诸美国或英国,则数年以来苦心筹划,始能得顾客欢心者,必为之声名失坠,贩路缩少”,因此“精密调查,区别可再制造与否,其可再制者,则标明为浸水茶”。^[9]1911年9月21日,将“同和栈汤陆钱之乌龙十袋”和“淡记号汤淡之茶末十六七袋”,“尽行烧

弃”,希望“维持台湾茶之声价,以扩张其贩路”。^[10]同年10月,再次烧弃5000斤浸水茶。^[11]1921年,共处分45件,没收茶叶5410斤,包括腐败茶27件,伪造5件,晒日茶5件,其他8件。^{[4](P18)}此外,茶商公会内置3名检查员,检查茶馆、茶栈、仲买业者等,希望取缔粗恶茶。^[12]检查员“每日巡回大稻埕茶商”,^[13]以遏止粗劣茶叶及不正当的茶业交易。1922年,粗恶茶案件虽减少至20件,但没收的茶叶却高达7980斤。^{[4](P21)}1923年之后,违约交易及粗劣茶案件明显减少,在1924年甚至“未出现晒日茶之制造与熏蒸茶等事,故会员之间均无粗劣茶之交易,更无有关违约处分之案件”。^{[4](P84)}但不可否认,个别茶商还是注重经济效益,偶尔还会有不重品质的现象发生,茶商公会对此都予以严厉惩处。1925年,茶价格上涨,但产量有限,部分茶叶者被利益诱惑,将粗劣茶叶日晒后出售,该年共“查处12人,累计没收3760斤茶叶”。^{[4](P88)}1930年7月28日暴风雨导致内港某茶商的乌龙茶1500斤遭洪水浸湿,而店主经烘焙后,准备出售,被茶商公会及时发现予以扣押,“将现品没收”,并加以处分。^{[4](P103)}^[14]1933年,有茶商将旧茶冒充新茶,也被取缔员发现,予以没收扣押并烧毁。^{[4](P112)}1938年8月,三芝共荣株式会社工场因干燥机故障,致使煤烟混入茶叶1917斤,公会发现后命其将该茶叶混入石灰,作为咖啡因原料,立即出售。^{[4](P145)}其实,清代的茶郊永和兴,就通过罚金、没入、调理、送官法办等方式来约束成员,“已经具备近代同业组织的性质”。^[15]茶商公会对行业的自律,是继承了茶郊永和兴的规约。日据时期,在茶商公会的积极努力下,虽个别茶商仍有违法行为,但数量越来越少,并且在茶商公会的稽查下,违法行为都能得到及时处理,维护了行业的声誉。

将粉茶混入茶叶中的做法,是茶业的一个惯习,尤其是乌龙茶不论粗、再制茶,都混入粉茶。但这种行为不被美国市场所接受,导致台湾乌龙茶在美信誉下降。1925年6月21日,茶商公会经过讨论,达成一致意见,“每袋53斤的粗制乌龙茶,混入茶粉比率不得高于2斤以上”。^{[4](P88)}1927年,茶商公会更进一步规定“每袋(五十三斤)不得混入茶末一斤以上”,这个规定引起茶商的讨论,很难达成一致。但经过种种协商,最终还是决定“乌龙茶一袋,若明知为混入茶末一斤以上”,而故意买卖者,一经茶商公会查出,则处以“罚金五圆以上五十圆以下”;而粗制茶53斤,混入茶末1斤以上者,“则扣除其斤量”。^[16]茶商公会规范了粉茶混入茶叶的数量,加强了行业的自律。

茶商公会在加强了行业的自律的同时,还注意奖励优良茶商。1922年10月,茶商公会在台北市举办台湾制茶品评会,对台湾制茶功劳显著者加以表彰。1922年,举行制茶品评会,计划对茶业功劳者行表彰。该经费8000圆,茶公会支出2000圆,茶商3000圆,总督府补助3000圆。^[17]制茶品评会中,共设有台北州室、新竹州室、参考品室及器具用品等4室,陈列出品茶样1100多点,和参考茶样,合计1200多点,几乎将台湾各地的茶都罗列进来。全台各地茶商都有参评,其中台北州683点、新竹州412点、台中州10点、台南州2点、高雄州4点,合计1111点。就茶叶类别来分,乌龙茶710点、包种茶378点、红茶1点、绿茶22点。在一周的期间,入场人员137813人,每日平均2万人。^[18]期间开放吃茶店廉价出售茶饮,共有9100人前来饮用,其中免费5970人,收费3130人。制茶品评会专门制定《台湾制茶品评会规则》,对品评会的组织、参评茶品、奖项等事项做出详细的规定。^{[4](P41)}经过评比,评选出一等奖20名,二等奖40名,三等奖60名。^{[4](P39)}^[19]^[20]^[21]以往的品评会或博览会,均由官方主导,而此次制茶品评会完全由茶商公会推动,尚属罕见。品评会“网络全岛各产茶地,不局限于一地方”,而且不论再制或粗制,搜集各品种,“出品数之多,为从来未有”,因此《台湾日日新报》评论其“对于茶业功劳者之表彰及对于输出洋行之赠以感谢状等,亦决非徒尔”。^[22]

市场经济要求法制、诚信与公正,但商人往往为了追求利益而采取投机行为,这既损害消费者的合法利益,也损害其他同行商人的正当利润,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因此,同业组织都注重自律,为矫正营业弊害、维护同业商人利益、塑造商业信誉的重要举措。台湾茶曾因假冒伪劣被美国市场排斥,影响到台湾茶在国际市场上的形象,削弱其竞争力。茶商公会对以次充好、缺斤少两等行为予以禁止,违规者予以严厉惩处,保证产品质量,维护行业信誉。同时,对于优良茶商的评定,更是通过激励机制提升质量,深化和发展茶商公会的自律行为。

四、余论

1895年之后,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政治、经济、社会发生了根本转变,“台湾茶业同业组织在短时期内实现了近代化”,“近代化的制度变迁完全受制于日本本土经济需求,是一种强制性的殖民地经济制度的输入,并非本土经济自然成熟发展的结果”。^[15]茶商公会在制度方面变迁,是为了满足日本殖民当局统制台湾经济的需求。同样,在业务方面的演变,也是和日本殖民当局的政策息息相关的。茶业是台湾最重要的产业之一,但台湾茶与日本茶自19世纪后期就是国际市场上强劲竞争对手。日本殖民台湾后,台湾总督府积极介入台湾经济,对台湾茶的种植、制作以及商业习惯进行调查,开始改造台湾茶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过渡,更加大了对台湾经济的统制力度。“作为殖民地的台湾,其茶叶生产与外销必须配合日本的利益,分散市场,争取最大的利润”。^{[23](P314)}在台湾茶的输出方面,注重美国和南洋市场,随着日本侵华的扩大,由南洋转向中国大陆。茶商公会的输出市场随着日本的侵略扩张而扩大。

同业组织与政府之间,通常维持着合作与抗争的二元路线。合作还是对抗,取决于经济景气等外在环境,以及政府与同业公会的双边态势。但在日据时期的茶商公会,完全看不到与台湾总督府的抗争,并且时有“慰军”的行为。“九一八事变”后,茶商公会陈天来会长捐献军费1000圆,并表示“当国家多事之秋,谨献此微款,以充军费之万一。请为转达上峰,得俯鉴微忱,而采纳之。”而台北北警察署署长岩田对陈天来表示嘉奖,“国家多事,军费孔亟,得君出此巨款,真是难得。忧国助军,忠诚具见,当即将情,转详知事。”^[24]1937年,茶商公会“鉴于目前之非常时局”,募集5655圆,捐献陆军3000圆,捐献海军2655圆。^{[4](P128)}同年,茶商公会透过台湾茶叶协会,将一磅装铁罐乌龙茶献给陆军400个、海军300个。^{[4](P129)}1938年,茶商公会指派会长陈天来等人,前往上海、南京、青岛、济南、天津、北京、张家口、山海关、奉天、大连等地,“敬献乌龙茶”。^{[4](P138-139)}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茶商公会还向陆军、海军赠送劳军款、杂志、扇子等。^{[4](P176)}目前所见资料,难以判断茶商公会是主动行为,还是被迫行为。但可以判断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茶商公会要寻求生存与发展,需与总督府保持良好关系。无论政局如何变动,利益诉求始终是商人的根本诉求。茶商公会的海外商工考察及市场拓展,经常配合时局,“伪满洲国”成立后,即派员前往考察。1932年,因包种茶市场大跌,台湾总督府殖产局决定请茶商公会蔡理事到南洋各地“留意于海内外茶况”,归来后“从实报告”。^[25]王春英分析抗战时期日占区统制经济下的同业公会,认为生存模式分为“服从式生存”和“合作式生存”。^[26]日据时期,由于绝大多数资源被殖民当局垄断,合作是茶商公会与殖民当局所处关系的主要方面。因此,茶商公会是服从台湾殖民经济,维持日常业务为主要特征,属于消极合作。

参考文献:

- [1]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
- [2]时局与台湾茶业(下)[N].台湾日日新报(日刊),1934-1-7(4).
- [3]台湾茶之更生,以拓开新贩路,为目下重要急务[N].台湾日日新报(日刊),1933-4-26(8).
- [4]许贤瑶.日治时期茶商公会业务成绩报告书(1917-1944)[M].台北:“国史馆”,2008.
- [5]台湾吃茶店得人[N].台湾日日新报(日刊),1903-7-26(5).
- [6]台湾馆之好评[N].台湾日日新报(日刊),1921-3-18(5).
- [7]粗恶茶の检查[N].台湾日日新报(日刊),1897-10-8(3).
- [8]不正茶业者の处罚[N].台湾日日新报(日刊),1899-12-6(2).
- [9]处分浸水茶[N].台湾日日新报(日刊),1911-9-16(2).
- [10]浸水茶之烧弃[N].台湾日日新报(日刊),1911-9-22(2).
- [11]焚烧浸水茶叶[N].台湾日日新报(日刊),1911-10-30(2).
- [12]取缔粗恶茶[N].台湾日日新报(日刊),1921-4-13(5).
- [13]取缔粗恶茶[N].台湾日日新报(日刊),1921-10-22(5).

(下转第86页)

- [8]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9]周良杰.福建生态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现状及对策[D].福州:福建农林大学,2013.
- [10]杨晓雯.福建沿海港口发展战略探究[J].中国水运,2014(6下):61-62.
- [11]吴飞美.福建循环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与调整思路[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135-137.
- [12]黄锡生.自然资源物权法律制度研究[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
- [13]吴晓青,夏峰,洪尚群,等.生态购买是西部生态建设的新战略[J].四川环境,2006(1):28-30.
- [14]朱文毅.关于福建发展战略的若干思考[J].发展研究,2013(5):68-71.

[责任编辑 陈丽]

(上接第55页)

- [14]浸水茶三十包,公会员发见,立弃现品[N].台湾日日新报(夕刊),1930-8-2(4).
- [15]潘健.日据时期台湾茶业同业组织制度变迁探析[J].福建论坛,2012(12):88-93.
- [16]茶商组合会决议取缔混入茶末[N].台湾日日新报(日刊),1927-5-27(4).
- [17]制茶品评会[N].台湾日日新报(日刊),1922-7-3(3).
- [18]制茶品评会大成功[N].台湾日日新报(日刊),1922-11-1(4).
- [19]制茶品评会[N].台湾日日新报(日刊),1922-8-22(5).
- [20]制茶品评会续闻[N].台湾日日新报(日刊),1922-8-29(5).
- [20]台湾制茶品评会[N].台湾日日新报(日刊),1922-10-17(5).
- [21]制茶品评会开会[N].台湾日日新报(日刊),1922-10-23(4).
- [22]茶品评会所感[N].台湾日日新报(日刊),1922-11-3(5).
- [23]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湾近代史(经济篇)[M].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5.
- [24]陈天来氏献军费,访北署长交千圆[N].台湾日日新报(日刊),1931-11-26(8).
- [25]督府调查南洋茶况嘱托茶商公会蔡理事到包种茶关系各埠视察[N].台湾日日新报(日刊),1932-7-23(8).
- [26]王春英.服从与合作:抗战时期日占区统治经济下的同进公会[J].近代史研究,2013(6):125-139.

[责任编辑 郑镛]